

父母的脚步

胡雪峰

民谣说:立秋核桃白露梨,寒露柿子红了皮。这不,中秋假期刚踏进家门,母亲便立即安排我们去采柿子。来到树下,抬头仰望,枝条上柿果累累,黄灿灿、红澄澄的果实,点缀着蓝色的天空,充盈着父母的满足。

妻子扶梯,我和儿子轮流采摘,父亲和母亲用竹篮将采摘下的柿子倒放在三轮车上,照例在母亲“不要采了,空点给雀雀啄啄”的叮咛声中收工。柿树果园距老宅有半里路,儿子骑上三轮车,妻子压床,满载先回。我陪着父亲母亲边走边聊,刚走了几十步,他们就已经气喘,并且嚷嚷:“儿子呀,你慢一点,走得太快了。”我立即停下脚步转身回望。此刻,秋阳温煦,父亲的头发却更显稀疏花白,母亲的背影弯缩成了弓弦。瞬间,我的心房一颤,可不是吗?父亲已年过八旬,母亲也近八十,他们已是杖朝之年,我们是时候放慢脚步了,慢慢地陪他们走好行稳。

父亲脚步何时慢下来的,我倒是没有印象,那是10多年前陪他看病的一次经历。父亲患支气管炎多年,随着年龄增长,一到冬季,打针挂水、住院治疗,甚是闹腾。我从报上得知,支气管炎属于典型的冬病夏治范畴,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准备去常州中医院治疗。我联系上医院的朋友,帮忙提前挂好专家门诊号。

那天,父亲起了个大早,从村上骑电瓶车赶到镇上,再坐大巴赶到花园车站。我从金坛坐班车赶去,会合后搭乘快速公交(BRT)前往。父亲带了些乡下的时令土特产,准备感谢我的医生朋友。我俩在文化官站下车,我拎着几十斤重的袋子走在前面领路,未行百步,忽然看不到父亲了,以为父亲难得进城,要边走边看看闹市区的风景,便停下等候。再行走时,我放慢脚步,将天宁寺、红梅公园、文化官广场等人文景观讲给他听。开始还好,后来我转身回头说话的次数越来越多,我走得并不快,是父亲的脚步实践跟不上了。这时,我才好好打量起父亲来:他头发花白,腰略微有些前倾,背有少许驼背,体型比以往更加消瘦。岁月无情,古稀之年的父亲已在不知不觉中苍老了。

有关父亲脚步,我有好多记忆。小辰光的春节,父亲挑着箩筐中的我们去亲戚家拜年,来回近百里的路,他从未觉得疲倦,遇到熟人问询,还自豪地打趣:“我挑的可是宝贝呀,这一头是米缸(儿子),那一头是酒桶(丫头)。”

父亲在20多岁时就有小名气。当年生产队组织挑担比赛,父亲将4箩筐稻谷叠放两边,一扁就挑了起来,新稻谷饱满,一箩筐足足百余斤。年轻气盛的父亲绕场一周,征服了第二生产队的社员同志们。30岁刚出头,父亲就担任了村大队会计兼副业生产队队长。有一年梅雨季发水,鱼塘涵洞被堵,随时有溃堤危险。父亲快步走到大家面前,说了声“我来”,他一口气灌下半瓶白酒,腰间拴好绳子,从大堤斜坡面跳入寒冷的长荡湖水中清理杂物,他那临危不惧的步伐,避免了村集体资产可能遭受的重大损失。

40岁时,已是村大队长的父亲,带领着村民们修筑了村里的第一条通往乡镇公路的大土路。父亲将泥土块粒装满板车,两手握紧板车柄,肩膀套拉上绳子,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脚踏实地践行“要想富,先修路”的理念。每次回家行走在这条两公里长的路上时,我总能回想起少年时观望父亲筑路时的情景。

高考填报志愿前,父亲来到金坛县城,我们并肩站在华罗庚中学东南侧的北新桥上。父亲告诉我,前天他当选了村支书。他和母亲建议我填报医学院校。原因很简单,亲戚中的3位医生受到大家敬重。那一刻,我们虽然停下了脚步,但流淌的丹金漕河水拍打着岸边台阶,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提醒我,父亲又将踏上新农村建设的征途,他和母亲鼓励我去追寻白衣天使的足迹。

我读大二时,父亲受命到镇采石厂工作。采石山塘就在村前一公里处,纯原始的开采,设施简陋,最多也就采石磨成石子。因产品单

一,采石厂成了烂摊子。接任后,年近半百的父亲格外忙碌起来。他起早摸黑,辗转于南京、常州、金坛等地。母亲经常在清晨被他的脚步声惊醒,却又在夜深人静时,期待着他的脚步声早点响起。终于,采石厂有了第一份石材成分的检测报告,采下的石头第一次被投入窑炉烧成水泥,账本上第一次有了盈余。他走累了,厂复苏了,腿泥子居然跟上了市场经济的脚步。

70岁时,父亲决心修订90多年前的宗祠家谱。这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全村一千多人的信息需要走访核实。身为核心成员的父亲戴上老花镜,拎上资料袋,每天走街访户,以脚步作笔,历时5年,写出了我们村的编年史《千年古村翟墅村》。感谢父亲脚步,让亲情血脉、家风习俗得以传承。

母亲的脚步,是我成长道路上的阶梯。

年幼时,每当生产队的记工员晚上点灯记工分时,我便跟随母亲前去,除了凑热闹,更重要的是母亲恳请记工员教会了我打算盘,并且坚持每天让我练习,爱好学习的种子从此萌芽。小学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频道出了三道有奖征答题,当我都回答出来后,母亲立即鼓励我写信回复,当听到邮递员自行车铃声时,她快步追了出去,千叮咛万嘱咐:“小玉师傅,一定要帮忙寄到,这是孩子第一次参加竞赛,他期待能收到回信。”初三秋学期,我有幸代表学校去县城参加作文竞赛。为了赶上早班车,母亲清晨4点便起床忙碌,早餐后陪我走往镇上的汽车站。秋色朦胧,寂静田野里,只有母亲和我的脚步声在响,忽然空中传来一阵“嗖嗖”声,母亲告知我,那是大雁南归的脚步。此刻,母亲的脚步引领我前行,她期待着我的振翅高飞。

母亲的脚步是大无畏的。1979年,溧阳发生6级地震,那是个夏日黄昏,父亲在大队部忙事,母亲和两个妹妹在家中,我在家门口玩耍,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紧接着脚下地面急促抖动,房屋不停晃动,大家惊呼着“地震啦,地震啦”,纷纷从屋里向外面空旷处奔跑,母亲跑出来后只看到我和大妹,便急切地高声呼唤“小丫头,小丫头”,见没有回应,母亲如离弦之箭,转身冲向屋内,抱出了小妹……

分田到户后,母亲利用农闲时间,挑着一副“鸡篮”担子,搞起了副业。

“鸡篮”是请竹匠定制的圆形竹篮,直径约80公分、高度约25公分,可叠放,一般一担4只,一头2只。从3月到5月,母亲每天起早摸黑,挑着百余斤重的担子走街串巷,从农家、养殖户手中收购鸡蛋,送到“哺坊”孵化成雏鸡,再从“哺坊”批发雏鸡售卖给千家万户,周而复始。我也曾跟着母亲一起赶集市、转村头,帮她计数算账。高中时的一个周六,我从县城到家已是晚上6点多了,母亲还未回家。我将书一包一放,就出发去接母亲,我连走带跑约3公里,来到新河桥附近。此时,天已完全黑了,偶见几点星光。黑暗中听到远方传来了熟悉的声音,我大声喊“妈妈”,对面也惊呼“峰呀,你怎么来啦”,激动不言而喻。从32岁到50岁,从分田到户开始,到孙子出生歇脚,母亲的副业之路,一走就是18年。18年,每年外出70天(近100天的生意,剔除气候、农活因素),每天20公里,母亲挑着重担,走了25200公里,是红军长征里程的2倍。按平均步幅0.7米计算,她走了整整3600万步。母亲踏遍了田园山村,脚印覆盖了方圆十公里范围的故土。她的脚步,浩气磅礴,染晚霞,缀星星,逐日追月。

国庆节当日,我应邀参加儒林镇篮球比赛闭幕式。我提前回到老家,接上父亲和母亲,开车来到河海大学校区和高铁站,领着他们观光。二老慢慢移动着脚步,左看看,右瞧瞧,手不时指指点点,向我问这问那,或又窃窃私语。儿子在南京工作,新房装修即将完工,当我说要带他们坐高铁去南京看孙子和房子时,父亲和母亲兴奋得像孩子似的,脸上写满了憧憬……

他们走累了,依偎在我身旁,我在中间。左手父亲,右手母亲,夫复何求?

序与跋

致敬清代叠山造园巨匠戈裕良

罗杨

回望中华造园艺术的漫漫历程,大师巨匠灿若星辰。他们的经历与成就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缩影,也是中华文明和国粹艺术最集中的体现与代表。

每当走进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环秀山庄,看到那些被誉为叠山理水经典之作的迷人景观,就仿佛会看到有一个人迎面向你走来,但是你却怎么也无法与他对话,这不光是因为我们和他之间隔着时间的距离,更是因为我们和他之间隔着时代的文化距离,我们只知道他的作品,而对他的了解太少了。这个人就是造园巨匠戈裕良。近日收到了常州薛焕炳先生所著《戈裕良传》的书稿,读后让我们感到可以与戈裕良走近了。

戈裕良以不凡的天赋,将普通的石头堆在一起,从而使之演变为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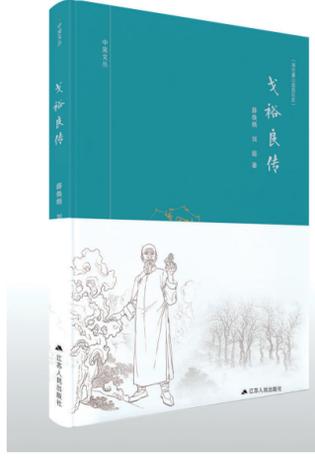
赞叹不已的艺术。可谓点石成金,平凡之中见非凡。

石是园林的精神,水是园林的精灵。咫尺天地间,叠山理水,便千岩万壑,柳暗花明。戈裕良的作品风格汇集了清初叠山的自然手法和乾隆时代石多土少的技巧,并将掇山理水技术推向了巅峰,其造园众多,佳作连连,包括常州西圃、苏州环秀山庄、苏州一榭园、常熟燕园等,将不同风格完美结合,堪为一代宗师。

戈裕良出身于贫寒之家,却自幼展现出了对造园叠山的浓厚兴趣和天赋。他年少时便开始帮人造园叠山,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学习,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戈裕良能够巧妙地运用“钩带法”,使假山浑然一体,既逼真真山,又可坚固千年不败。除了叠山技艺高超外,戈裕

良还是一位全面发展的造园家。他不仅能够叠石造山,还能够营造园林,将绘画、诗词等艺术手法融入其中,使园林更具诗意和美感。遗憾的是今天我们能看到他的作品已经是少之又少。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造园技艺一直被认为是“匠作之事”,士大夫阶层不屑与之之为伍,加之受传统“匠不入籍”观念的影响,戈裕良的传奇人生也少有记载。薛焕炳先生基于寻觅史料、田野调查等多方努力,力求重返戈裕良所处时代的历史现场,不断打捞历史碎片,糅合史学、考古学、民间文学、口头传说等多元学科视角,大胆探索、小心求证,复活历史、还原过往,点点滴滴打捞在历史长河中失落的真相,终于向世人交出了一部丰满的传记。



《戈裕良传》告诉我们一个史书中没有记载的戈裕良,让我们看到一个鲜活的戈裕良。书中对戈裕良的经历进行了文学的创作和想象,作者将对史料挖掘和自身游走于园林界的经历感受和理解,进行了创造性的融合,对一些细节加以合理的揣度和还原,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地再现了戈裕良的言行举止,从而可以让读者看到一个真实的文化匠师。

此书的魅力,不只在让我们了解了戈裕良,更提醒我们,我们对于戈裕良的了解是多么的不够。薛焕炳与戈福庆、刘超等人用了数年时间,耗费大量精力,带领我们向戈裕良那曲径通幽的山水世界慢慢靠近。以一种不同于只是平铺直叙地展现人物生平表达,而是在叙事的同时关注到将主人公的历史地位以及后世对他的评价,一并呈现给读者的大开大合的手笔,使读者与作者产生一种联系和沟通,在阅读中共享着对中华民族美好精神家园的共同体验。

今天品读戈裕良之于我们这个时代,除了对大师的高山仰止之外,更在于呼唤当代中国园林大师的出现。

(本文为《戈裕良传》序,题目为编者所加。作者为中共中央文史馆特约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中国民间建筑与园林艺术委员会会长)



临古小品(国画)潘杰

江南水乡因水而兴。

上世纪80年代前,冬季是农村最清闲的时候,但也是疏浚河道、清理沟渠的农田水利建设“旺季”。官方称之为兴修水利,农村老百姓俗称“开河”。在那个年代,开河、开渠、筑坝、填塘根本没有挖掘机、推土机之类,靠的都是双手和肩膀。

记忆中的1977年的新年伊始,生产队长上门“抓”了我的“公差”,说是会计不在家,要我和他一起上工地领任务。当时我17岁,一个刚刚高中毕业、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路上得知,“哺坊”孵化成雏鸡,再从“哺坊”批发雏鸡售卖给千家万户,周而复始。我也曾跟着母亲一起赶集市、转村头,帮她计数算账。高中时的一个周六,我从县城到家已是晚上6点多了,母亲还未回家。我将书一包一放,就出发去接母亲,我连走带跑约3公里,来到新河桥附近。此时,天已完全黑了,偶见几点星光。黑暗中听到远方传来了熟悉的声音,我大声喊“妈妈”,对面也惊呼“峰呀,你怎么来啦”,激动不言而喻。从32岁到50岁,从分田到户开始,到孙子出生歇脚,母亲的副业之路,一走就是18年。18年,每年外出70天(近100天的生意,剔除气候、农活因素),每天20公里,母亲挑着重担,走了25200公里,是红军长征里程的2倍。按平均步幅0.7米计算,她走了整整3600万步。母亲踏遍了田园山村,脚印覆盖了方圆十公里范围的故土。她的脚步,浩气磅礴,染晚霞,缀星星,逐日追月。

步入工地,彩旗飘飘,“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等宣传标语一个接着一个,高音喇叭里男高音、女高音此起彼伏……

我俩很快到了属于我们大队的工地现场。不一会儿,全大队“领任务”的各生产队人员悉数到齐,先是大队书记做了简单动员,然后,由大队长和大队会计按照“抽签”的方法进行工地划分,当场画了灰线,立了标杆,并在灰线上“扎”草作为标志。

隔日,乡村道路上出现一道亮丽的风景:三五成群的民工,或用板车拉着铁锹、镐头、钎头、挑箕等工具,或挑着铺盖,或扛着炊具,一支浩浩荡荡的

队伍涌入工地,颇为壮观。

芦家大队被安排在庙圩村居住,而我们16队的驻地距离工地只有300多米。按常理,开河都是挑选男壮劳动力参加,可我队除了10来个男劳力外,还有8朵“金花”(一人作为厨娘)。男的住在村上一位蒋姓人家,8朵“金花”则住在隔壁王姓人家。按照队长的说法: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蒋姓人家住房较为宽敞,还带有一个院子。我队10多个男的睡一屋,分两排打了地铺,中间只留下不到30厘米的“路”,头一律靠在两头墙壁,以防晚上起夜踩路。

地铺当时在乡村比较盛行,简单而又便捷。记得小时候,家里来了亲戚、朋友,我就喜欢抢地铺睡。一是出于好奇,二是为了好玩。只要选择一点空地,铺上厚厚的稻草,再垫上床单、被褥,地铺就成了。睡上去柔柔的,堪比土沙发,很是舒服。而且,任由玩耍、翻滚都没有摔下“床”的顾虑。

解决了“睡”的问题,“吃”的问题怎么办呢?生产队长征得主人同意,在院子里搭了一间简易灶棚,垒了锅台,置备了炊具、水缸、竹篮等生活用品。

在那个年代,能够参加开河是一种幸福。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切以开河为中心,所有工作和物资保障首先确保工程需要。开河的民工每天还有3毛钱的伙食补贴。我队地处集镇,集体“三产”搞得较为红火,对开河的补贴相对高一点,伙食三天小改善,一周大改善,至于完工“酒”就更不用说了。

安排好吃、住的第二天,开河的“战场”正式拉开。一眼望不到边的开河工地上,人头攒动,声势浩大。几千名民工奋战在工地一线,着实让我大开眼界。

都不想多干,土越挖越深,自然越留越多,变成一堵“土墙”。

当天下午,身为工程总指挥的生父,例行巡查时看到那片“土墙”,当即通知各大队领队到此召开现场会,并由双方各派两人清除了土墙。之后整个工地再没有出现类似情况。

开河对于我这个刚刚回乡务农的小青年来说,还真是大姑娘坐轿子——第一次。头几天,只是在平地上凿土开挖,挑担子走路较为轻松,加上有种新鲜感,一天下来感觉不是很累。随着河坡越来越陡,双脚既要蹬力,肩膀还要控制重担平衡,一个来回已是气喘吁吁,我感觉非常吃力。时间久了,我的手掌磨破了,肩膀压肿了,到了晚上全身腰酸背痛,骨头仿佛也散了架。好在我们小组的正、副组长处处照顾和关心我。有时安排我挖土,有时安排我去坡道清理道路渣土,有时又让我到大坝上平整场地。经过磨炼,我慢慢地适应了这样的“苦活”,也听进了生父的告诫:“年轻人多吃点苦没关系,这样对将来很有好处……”

开河期间,队长将我们20多人分为3个小组。我们这组6男3女,一男一女为正副组长。组长司马大哥,一米八六的身材,皮肤较黑,体格健壮,几百斤重的担子挑起来健步如飞。工地上寒风刺骨,可他身穿单衣还是汗流浃背。他力大无穷,饭量也大得惊人。开河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凡是民工吃饭用粮必须保证管够、管够。因此,早晨直径四五厘米的圆形米粉饼一般人吃10来个即可,而他肚子里能装下三四十个,中午更是3大碗米饭不在话下。于是,人们送他一个雅号——“大碗哥”。

副组长胡姐也不逊色。她是个有名的“假小子”,一米六几的个子,齐耳短发,清纯、靓丽、干练。胡姐在工地上全然忘了性别,男劳力干的,她一样也不落后,及时、快速、按质完成土方工程,可谓巾帼不让须眉。说实话女

同志上工地有诸多不便,但她全然不顾。有一天,胡姐感冒发烧,按常规应该回家休息,可是她吃了药之后,依然奋战在工地第一线。

冬季开河,早晨按时起床是领队较为头痛的事情,一些大老爷们平时喜欢捂被窝、睡懒觉。每天早上,队长便吆喝大家赶紧起床吃早饭。有时,大伙儿调侃队长是《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队长非但不生气,反而连“骗”带“哄”将这帮大老爷们管理得服服帖帖——“晚上加餐”是大家最爱听的一句话。

加餐对于平时生活鲜见荤腥的民工来说,无疑是件快乐的事情。工地上大多数生产队的伙食几乎都以青菜、萝卜、豆腐等为主,外加一点肥肉熬油起鲜。我们队长则编了一个顺口溜:民工吃不好,重担无法挑,要想完工早,荤菜不能少。于是,我们生产队的伙食顿顿有荤,猪肉、鲜鱼、家禽,餐餐不这样,我们将猪肉转化成明日挑土方的劲儿,将鸡肉转化成爬高的蹬力,将鱼肉转化成了干活的动力。

开河期间最开心、最热闹的场面莫过于看电影。工程指挥部除了下拨粮油,增发猪肉、禽禽指标外,放映露天电影是慰劳民工最得人心的。工程指挥部基本安排放映老片子,诸如《南征北战》《上甘岭》《列宁在1918》等。这不仅丰富了民工的文化娱乐生活,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一旦遇到雨天,民宅的地铺成了我们的天下,大伙儿在地铺上玩耍或者说笑、打牌或者下棋。

我们一天一天招手迎接日出,又一天一天将落日送走,河床也一天一天清晰起来。转眼,到了开河的关键时刻——“拉河心”,其实就是挖河底。挖河底在开河中属于最累、最苦的差事。即使一个人空着手爬近二十米的湿滑高坡,到了上面已经是气喘吁吁,可想而知,再有重担压肩,那是多么艰辛!

最讨厌的是我们在挖河底时遇到“流沙”泥土。这种“流沙”泥土稀稀的,但又比泥浆干一点,黏性十足,一般的工具无法使用,干活的人必须穿高腰雨靴。好在队长脑子灵、反应快,当即派人回家用绳子、化肥袋子做成敞开式的兜兜挑箕,效果相当不错……

岁月流逝,如今再也听不到哪里还有人工开河,挖掘机、运土汽车等各种机械设备的轰鸣声则在耳畔响起。

山水典藏

(篆刻)

周俊海